

近年来, 古建文旅持续攀升。“古建游”正成为大众触摸历史文脉、寻迹“历史里的中国”的新风尚。本期聚焦三本与古建筑相关的图书:《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邀约11位学者重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现场,于战火年代的测绘笔记与今时今日的保护现状之间,解读中国古建筑屹立千年的结构密码;《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从榫卯构造出发,对比不同国家的木构传统,揭示东西方文明在思维逻辑与美学追求上的差异;《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寻访笔记》像是一场踏实的田野行走,在讲解木构知识的同时,讲述古建筑背后的壁画、彩塑、碑刻以及历代乡民守护它们的动人故事。三本书,三种进入古建筑的方式。当脚步抵达那些历经千年的梁柱与斗拱之下时,目光所及,便不只是风景,更是文明延续的温度与力量。

——编者

榫卯里的文明史

□左拉拉

学者刘妍所著的《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以下简称《榫卯》)并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榫卯知识读物。它既不满足于介绍榫卯类型,也不以赞美传统工艺的精巧为主要目的。作者试图以“榫卯”这一木构建筑中最重要的技术节点为入口,重新梳理东西方木构文明的结构逻辑、材料观念、技术传统和文化选择。

去神化的全新表述。榫卯常常被视为中国古代智慧的象征,被概括为“不用一颗钉子”的神奇技艺。这种说法在大众传播中固然很有感染力,却也容易产生误解。该书首先处理的,正是这一被过度神化的叙事。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并非完全不用铁钉,铁钉在小木作、装修、屋面构件等部分都有使用;所谓“不用钉子”,必须放在特定结构部位和特定材料语境中理解。更重要的是,不依赖铁钉的木构连接方式,也并非中国独创,而是许多成熟木构文明都会采用的技术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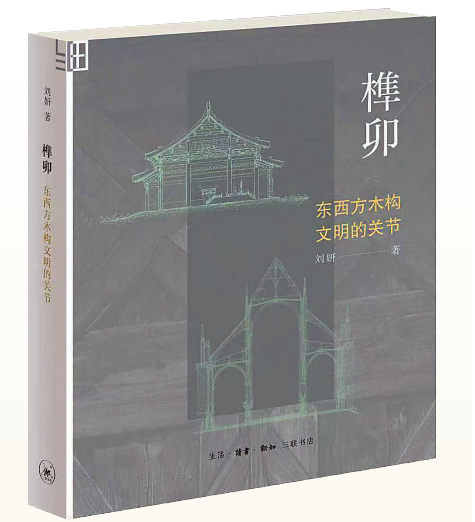
这一判断看似削弱了榫卯的民族独特性,实则使榫卯回到更真实、更复杂的历史位置。作者并不是要否定中国榫卯的成就,而是反对把它简单包装为孤立的民族奇迹。榫卯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否“独一无二”,而在于它如何回应木材的材质、构件连接的需要、结构稳定的要求以及施工组织的限制。榫卯不是被抽象出来供人赞叹的文化符号,而是一套在具体建造实践中生成的成熟的技术系统。

木构文明史是一部世界史。维也纳工业大学克劳斯·茨韦格教授于1997年首版的《木与木节点》,在2015年第三版扩增后,副标题改为“欧洲、日本与中国的建造传统”,是这一领域第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作。茨韦格教授的研究以鲜明的跨文化视野,系统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区木构节点在形态、构造与建造传统上的差异。十多年后,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榫卯》进一步引入了中国建筑史内部的问题意识。刘妍(她正是《木与木节点》的中文版译者之一)不只是比较不同地区“有哪些节点”,而是借助这些比较回应中文语境中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

《榫卯》最鲜明的特点,是把木构文明当作一部世界史来写。“世界史”是贯穿全书论证方式的基本框架。作者几乎在每一个结构技术细节上,都引入世界不同地区的案例加以比较。谈榫卯起源时,书中不仅涉及中国河姆渡遗址,也援引欧洲新石器时代水井和古埃及细木工;谈燕尾榫时,不仅梳理中国传统名称,也考察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等不同语言中的命名方式;谈梁柱相交、柱框架、拉结、桁架、井干、钉销栓楔等问题时,作者也不断在中国、日本、欧洲乃至更广泛地区之间反复比较。这种写法避免了把中国木构孤立起来讨论,也避免了把“东西方比较”处理成抽象的文明对立。作者总是从具体技术问题出发:面对同样的木材连接任务,不同文明如何处理?面对同样的梁柱相交、跨度扩展、结构稳定或安装顺序问题,不同地区的匠人采取了什么策略?这些策略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材料观、结构观和文化偏好?正因为比较始终嵌入具体构件和节点之中,该书的全球视野才不是空泛的大叙事,而是由一连串细密的技术观察支撑起来的。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榫卯》回应了木构建筑在以石构为中心的世界建筑史叙事中所长期遭遇的质疑。所谓“中国建筑(相较于西方)为什么使用木构”这一问题,本身并不完全成立。对于拥有悠久木构传统的北欧和中欧而言,使用木材建造并不是一件特殊或需要解释的事。真正隐藏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或许是石构中心主义所形成的建筑史价值标准:石材更容易被赋予宏大性、纪念性与永恒性,而木构则常常被置于需要自证其价值的位置。因而,当我们讨论榫卯、斗拱、曲屋顶、桁架和各类木节点时,实际上也在开启一种以木构为中心的建筑史叙事。

跨文化物质文明研究的基础。该书另一个极具价值的方面,是对术语、翻译和分类问题的高度重视。跨文化物质文明研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材料本身,而是语言和概念。一个



《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刘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1月

本书以榫卯为“关节”,串联起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发展脉络。榫卯不只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精髓与灵魂,更是世界木构营造体系共通的核心技艺。面对各异的地域环境、建造需求与文化底色,东西方匠人依托榫卯演化出截然不同的营造思路,孕育出不同文明独有的建造智慧

中文术语、一个德语术语、一个英语术语,看似可以互译,实际上往往对应不同的技术系统、匠作传统和知识分类方式。作者在全书许多章节中不断提醒读者:术语并不是附属于技术之后的标签,而是技术知识的组织、传承和理解方式。例如,书中对“燕尾榫”一词的讨论,不仅是词源考证,更是技术知识跨文化流动的典型案例。作者认为,当代中文中通行的“燕尾榫”并非传统汉语匠作术语,而是与现代技术翻译、外来术语输入和知识传播密切相关。又如,将“榫卯”简单译为英文中的“mortise and tenon”并不准确,因为后者更接近直榫这一具体类型,不能涵盖中文“榫卯”所指涉的复杂木作连接系统。类似地,欧洲语境中的 joint 或德语 Verbindung 更偏向“连接”,也不能完全覆盖中国木构节点同时承担传力、稳定、安装、等级和审美组织等多重功能的复杂性。

第十三章“术语与分类”,表面上讨论的是榫卯术语,实际上触及的是跨文化技术研究中最根本的方法问题:不同文明如何命名技术,如何通过术语整理经验,又如何在分类体系中呈现自身的匠作思维。作者分别讨论德语、日语与汉语中的榫卯术语体系:德语术语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整理和分类意识;日语术语深植于大工传统,显示出日本木作对节点细节的关注;汉语术语更多带有匠人经验、形象比喻和地域传统的痕迹。因此,第十三章并不只是“解释名词”,而是向读者说明:术语本身就是文明比较的材料。一个文明如何给构件命名,如何区分榫、卯、节点、连接、构造,如何决定哪些差异值得命名,背后都体现着它对木构技术的理解方式。

《榫卯》是一部以榫卯为入口,重新理解东西方木构文明关系的思想性著作。它让读者看到,所谓“关节”不仅存在于木构构件之间,也存在于文明之间、语言之间、技术与观念之间。通过榫卯这一关节,木构文明不再是中国传统建筑史中的局部问题,而进入了一部值得重新书写的世界史之中。

(作者系上海纽约大学艺术史副教授、文化遗产数字化实验室主任)

当古建考据成为当代空间创作的方法

□崔冬晖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古建筑,最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种是把古建筑当作纯粹的遗产,停留在“保住了多少座”的保护计数上;另一种是把古建筑简化为风格符号,把飞檐斗拱嫁接到钢筋混凝土表面,制造一种虚假的文化连续感。前者使古建筑沦为博物馆标本,后者使之退化为商业地产的装饰面具。两条路都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即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体系能否真正成为当代空间创作的方法。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回应路径。王澐、王贵祥、方拥等11位建筑史与遗产保护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的这本著作,以营造学社当年实地考察路线为线索,从天津独乐寺到北京故宫,共十站,涵盖了汉代石阙到明清皇宫的建筑类型谱系。但该书真正的价值并不只是一部古建筑通识读物,而在于它所提示的一种“再营造”的可能性,即营造学社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可以被提取、转化和激活的空间认知方法。

1932年到1941年,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在战火中走过190个县市,测绘了大量濒危古建筑遗存。这段历史已经被多次讲述,但是大部分的叙述都只在情感方面展开,即学者的家国情怀、学术报国的悲壮、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这些维度当然重要,但是若一直停留在情感叙事上,就无法看到营造学社更深层的方法论贡献。

该书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用自己的学术训练重新进入考察现场。方拥写独乐寺,追问的核心是观音阁何以抗震千年,其背后的结构逻辑究竟是什么,进而引出“中国古建筑领域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工匠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结构智慧,为何未能形成类似西方的力学理论体系?永昕群写应县木塔,也并未停留在“千年奇观”的感叹上,而是细致拆解了这座八角五层木构佛塔的结构科学价值,讨论其残损原因、倾斜监测数据和审慎的保护计划。王炜写佛光寺,从创建选址、唐代营建活动、格局变迁一直推进到现代的发现与保护,构建出一条完整的“建筑生命史”脉络。以上各章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在回到营造学社原始方法(实地勘察和文献互证、结构分析和历史叙事并行)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记录”变成“辨析”,从“发现了什么”变成“这说明了什么”。这种推进并非对前章的简单致敬,而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溯源和更新。

在阅读该书时,最具启发性的段落,往往出现在学者们对结构逻辑的耐心拆解之中。中国古建筑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认知上的困境,即公众对于它的认识只停留在视觉层面。飞檐翘角之美、斗拱之繁复、木构之精巧,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赞叹,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些形式背后所蕴含的结构原理和空间组织逻辑。因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才是导致古建筑知识无法转化为当代创作资源的根本原因。

我钟情于中国古建筑,至今已有二十载。其间写下诸多文字,多发表于网络平台。感谢戴欣倍编辑,在她的推动下,我得以将多年积累的文稿系统梳理并汇编,最终完成《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寻访笔记》一书。这本书,是我二十年来行走大地、探访古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完整记录。喜爱古建筑,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于我而言,亲临现场踏勘调研,不只是一场愉悦身心的研学之旅,更是支撑我多年坚持、乐此不疲的动力源泉。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古建寻访与保护的队伍,我倍感欣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以山西存量最为丰富,且绝大多数深藏乡村。二十年间,我数十次奔赴山西寻访古迹,亲历了这片土地的巨大变迁。早年深入乡间,连一处吃饭的地方都难寻觅,只能随身携带方便食品充饥。如今早已今非昔比,即便偏远山沟,农家院、小餐馆随处可见,出行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也正因当年食宿不便,初入村子时,老乡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吃饭了没有?”我与他们素昧平生,不过是登门询问寺庙钥匙的去处,却常被热情挽留吃饭。这份质朴善意,是难得一见的温暖,也让我满心感动,总想着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

随着往返山西的次数渐多,我愈发清晰地看到,乡村中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各县市的普遍困境。单凭乡村自身力量,根本无力承担庞大的修缮费用。我能做的,便是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珍贵遗存走向损毁。这既是对古建的守护,也是对山西老乡多年照拂的一份回报。山西乡村古建濒危的状况,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最先响应的,是媒体记者。先后有近百位记者与我一同深入山西实地考察,刊发了大量报道。随着新闻报道持续发声,我前往山西的次数也愈发频繁,曾有三年时间,我每年往返数十次。陪同记者朋友们踏勘现场之余,我也有更多机会深入乡村,探访更多鲜为人知的古建筑。我渐渐发现,不少文物保护单位不高的古建,内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珍贵价值。

长治上党区东呈古佛堂尚存两座大殿,均为明代遗构。其中五间后殿的四缝主梁,直径均超

本原因。

方拥关于独乐寺观音阁的讨论,从结构上分析了该建筑作为辽代建筑“承前启后”的结构地位,并提出了观音阁高度之谜和抗震之谜两个问题。这一讨论已超出了技术科普的范畴,实质上是在揭示一种判断:中国古代工匠对力学关系的处理方式,隐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力学传统的空间思维。周乾写北京故宫,从“大内屋顶的秘密”入手,层层深入到太和殿的立柱稳固之谜、紫禁城装修的特殊之处,直至文渊阁的防火观念。这种从个案入手、层层展开结构肌理的写法,把一座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还原成一系列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分析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的结构辨析中,古建筑开始从“遗产”的被动身份中挣脱出来,逐渐呈现出可被提取的空间知识体系。王澐在该书引言中论述中国古建筑基本特征时提到,中国木结构体系的主要特点就是装配式,即用相对小尺度的木料来形成一个高度灵活的装配体系。林徽因在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中也提到,装配式建筑是当时西方人所探索的现代建筑模式。因此,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逻辑,当以西方尺度来衡量时,就已经具有现代性。书中的结构辨析工作,实际上是在为这种知识的当代转化打下基础。

梁思成、林徽因在1932年所著的《平郊建筑杂录》中提出了一个富有趣味的概念——“建筑意”。他们认为,中国建筑的价值不在于技术的精湛,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空间感受力。该概念在当时更接近于一种感性直觉,但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重新审视,它实际上指向了一个关键命题:古建筑研究的终极目标,不能只是弄清楚一座建筑“怎么盖的”,还要回答它“为什么让人感动”。书中贾珺所写的太原晋祠一章,特别体现出对“建筑意”的自觉回应。他在论述晋祠的建筑结构、历史沿革时,又着重分析了晋祠作为一个“六世同堂的建筑谱系”所具有的时间厚度,以及“精巧宜人的园林盛景”所包含的空间经验。他专门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建筑意’”为章节标题,把对物质空间的实证分析引向了对文化意蕴的追问。顾凯所写的江南古建筑部分,通过还原营造学社两次江南考察的历程,着力揭示了南方建筑与北方官式建筑之间空间逻辑的深层差异。上述讨论的意义,在于将古建筑研究从单纯的技术考证引入空间文化的维度。只有在这一维度上,古建筑知识才有可能和当代建筑设计、公共美育、城市更新等议题真正对话。“建筑意”所指向的不是怀旧情绪,而是一种空间创作的方法论资源。它使当代的创作者意识到,空间不是功能和结构的容器,而是一个文化感受力的生产场域。

就保护层面而言,营造学社的遗产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继承。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体系日趋成熟,文物保护法不断完善,数字化测绘技术使传统的手工测绘精度大为提升。但是该书引发的思考,是另一层问题,即营造学社的方法能

古韵绵长的背后是无数次竭尽全力

□唐大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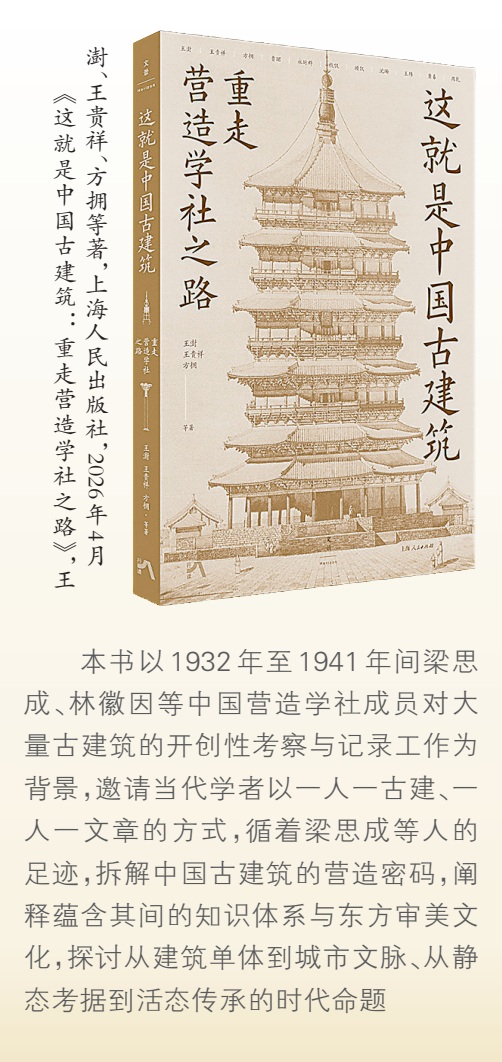


著·《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寻访笔记》,唐大华著,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3月

过一米,是我实地所见最为粗壮的木梁,现场气势极为震撼。每一根主梁,体量之大足以从中锯开分作两根使用——长治潞州区马厂崇教寺的工匠便曾如此操作,以节约用材。东呈古佛堂的营造者并非不懂此理,却执意选用整根巨木为梁,追求的正是雄浑壮观的气象,以用材的磅礴气势彰显庙宇的庄严威仪。500多年前的这份坚守,为后世留下了一处可直观感受古代工匠气魄与智慧的珍贵遗存。

平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常年游人如织。而在平遥乡村,仍保存着众多默默无闻的古建筑。长则村距平遥古城约16公里,地处僻远,村中晋明寺为明代建筑群。2012年初访时,这里已荒废多年,院内荒草萋萋,正殿屋顶大面积坍塌,但殿内留存大量壁画,笔触神韵与永乐宫壁画极为相似,堪称“平遥小永乐宫”。最终,在媒体与各界热心人士的共同呼吁下,晋明寺得以抢救修缮,并于2019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外界关注而重获新生的古建筑还有很多。每次重访修缮完毕的古寺,我都由衷感慨,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三晋大地上写下的生动篇章。

不少人好奇,为何山西能保存下数量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历



本书以1932年至1941年间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大量古建筑的开创性考察与记录工作为背景,邀请当代学者以一人一古建、一人一文章的方式,循着梁思成等人的足迹,拆解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密码,阐释蕴含其间的知识体系与东方审美文化,探讨从建筑单体到城市文脉、从静态考据到活态传承的时代命题

否超越保护的范畴,成为当代空间创作的认知基底。萧易所写的广汉古城一章,在这一方向上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示范。他做的不是单体建筑考察,而是以文庙、文昌宫、牌坊、会馆、宗祠等不同类型的建筑遗存来重建一个传统城镇的完整空间图景。视角的转变很关键,它意味着从“单体保护”转向“空间系统”,从关注“建筑物”到关注“建筑群与城市肌理”。这正是当代城市更新和空间设计最需要的认知框架。

王澐本人的建筑实践,是这条“再营造”路径最有力的注脚。他在设计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时,大量使用回收的旧砖瓦建造“瓦片墙”,用夯土技术建造现代建筑,将传统的民居砌墙方法与钢构玻璃并置。在杭州国家版本馆的设计中,他把宋画的构图逻辑作为空间组织原则,用当代材料和技术营造出“宋代园林意象”。这些做法既不是对古建筑的复制,也不是将传统元素贬低为装饰贴面,而是从传统营造的材料体系和空间逻辑中生成一套新的建筑语言。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史上营建风气极盛。山西由多个盆地组成,地缘相对封闭,乡土社会自成体系,民间信仰深入生活方方面面,祠庙、佛堂、道观遍布乡野,逐渐形成崇神敬祀的传统。其二,战乱损毁较少。群山环抱,地势阻隔,山西远离中原核心战场,大量乡村古建因此幸免于战火。其三,气候条件适宜。黄土高原干燥少雨,木构建筑不易腐烂,天然利于长久保存。其四,乡土守护与民俗延续。晋商富庶、宗族凝聚力强,历代乡民持续修缮维护。即便无力大修,也极少主动损毁构件——“无力修缮但绝不破坏”的淳朴民风,成为山西古建大量留存的坚实基础。

木结构建筑本就怕火怕水、极易损毁,能跨越千百年保存至今,离不开历代守护者的持续修缮。我们今日所见的每一处古庙,看似静立无言,背后却凝聚着一代代人不计其数的竭尽全力,这正是古建筑最珍贵的价值所在。有幸加入这支守护队伍,也为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珍贵记忆。

近年来,大批古建筑得以修缮,不少地区恢复庙会,乡村戏曲等传统民俗也随之复兴。一座古建,不仅承载着建筑、彩塑、壁画艺术,更有着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好一座古建,带动的是一整条乡村文化产业链的复苏与振兴。若古建筑不复存在,乡村文化的根脉也将逐渐消亡。所幸在最危急的时刻,一群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挽救了濒临消失的乡村传统文化。

中国古建筑能带给我们什么?答案不止于文化层面,更有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如今大家有目共睹,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知名古建游人如织,佛光寺、南禅寺等昔日冷门古迹也迎来大量游客。今年五一期间,佛光寺甚至启用了规模巨大的临时停车场——而在2010年前后的多次到访中,那里既无停车场,也鲜有游客,门前路边往往只停着两三辆车,更多时候只有我一辆。如今变化翻天覆地,未来更值得期待。佛光寺能迎来客流,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吸引游客的核心,正是建筑文化与传统文化。

这朵扎根乡土的希望之花已然绽放。愿这本小书,能为乡村古建的保护、活化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系古建筑爱好者)